

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

郝庆治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生态哲学既包含对自然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及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的思辨，也包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与之相伴的是我国生态哲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长足发展。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原理性理论成果为基点，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是进一步深化生态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明确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点

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集中体现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及其国际学术话语权。知识体系的建构，既不是搭建空中楼阁，也不能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坚实稳固的理论基点之上，是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形成完整、成熟的知识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应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这一重要思想中的原理性理论成果为基点，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深化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

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本体论基点。哲学学科的发展，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基础和前提在于具有自身的本体论基点。本体论基点是否坚实稳固，能否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决定了哲学知识体系是否稳定，是否具有长远发展的空间和张力。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生态哲学研究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也是建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命题。正是基于对这一基本命题的思考和回答，不同生态哲学发展衍生出各自的源

流体系。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理念。生命共同体理念，从本体论层面深刻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摒弃了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割裂对立的观点。在生命共同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彼此依存、互融共生的有机整体，自然是生命之母，人因自然而生，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必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生命共同体理念既体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的魂魄，也蕴含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的高度契合性，开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新图景。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应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本体论基点，遵循生态哲学创新发展规律，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的高度契合性，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不断探索和延展知识体系建构的空间、进路，构建和完善新时代生态哲学的知识话语、研究范式、学术理论，推动形成概念之间、范畴之间、理论之间相对成熟稳定的经验联系和结构关系，建构并不断发展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思想脉络的知识体系。

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价值论基点。哲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建构，并非绝对价值中立的知识概念集成，而是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追求。生态哲学研究注重从整体性、系统性层面认识和把握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互动过程和内在机理，自然而然会形成看待自然、对待自然的价值观点，并逐渐发展形成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内嵌于生态哲学知识体系，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塑造着知识体系的价值立场、价值导向、价值判断。不同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蕴含其中的生态价值观也具有差异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嬗替”“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彰显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价值观。这一生态价值观强调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而缘木求鱼，强调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一生态价值观与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和片面追求生态至上而“去发展”“去增长”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新时代，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既体现在指导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中，也内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应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生态价值观转化为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的价值内核，坚持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价值论基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

论理解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自然天地运行规律的敬畏意识和遵从意识，以理性思辨的解释力、影响力巩固壮大全社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论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并非从理论到理论的关系构建，而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载体和纽带的双向作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通过有目的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自然以相应的方式反作用于人类。顺应自然规律的实践活动，就会得到自然的回馈，而违背自然规律的实践活动，则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也有不少内容基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比如，《孟子》中讲：“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中讲：“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又如，《吕氏春秋》中讲：“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中国式现代化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应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论基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导向，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注实践、指导实践的优良品格，注重人作为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活动的客观物质性、社会历史性，探寻、梳理、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取得的原创性贡献，将知识体系的建构置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加以检验，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体系化、学理化支撑。

拓展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的方向和路径

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程中建构，并在认识、阐释和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这是这一知识体系彰显自主性、巩固主体性的关键所在。这一知识体系的建构，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以破解当今世界普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推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为使命任务，具有多学科融合发展等特征。

坚持融会贯通，构建多学科融合发展的学科体系。跨学科性，是生态哲学研究的鲜明特征。生态哲学知识体系是多学科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生态哲学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生态

环境问题的发生，往往是多维度、多层次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全面、彻底地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要求生态哲学研究必须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整合融通生物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发展形成理解、分析、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认识论、方法论，才能形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认知。伴随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美学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为进一步深化生态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应充分利用多学科融合发展带来的机遇，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发掘跨学科研究的交汇点、融通点，推动形成多学科交流对话、协同攻关的研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在多学科融合发展中探寻生态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问题、新框架，推动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更加健全完善。另一方面，借助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的不断发展，为生态文明相关学科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方法论支撑。

坚持以我为主，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体系。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基于学术体系的深度发展。中国生态哲学学术体系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和文化传承，集中体现中国学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国外生态哲学研究中的先进方法和有益成果，我们应当学习借鉴，但不能将之奉为圭臬，在学术体系建设上搞成套拿来。构建和发展中国生态哲学学术体系，必须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坚持以我为主，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将中华民族的丰富生态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中国生态哲学学术体系的鲜明标识和理论优势，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提供有力学理支撑。

坚持胸怀天下，构建具有国际引领力的话语体系。生态环境问题具有跨国界、跨地域的全球性特征，生态哲学研究以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问题为对象，具有鲜明的世界情怀。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需要开放式的交流交融。交流交融的前提和载体，是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引领力的话语体系。中国生态哲学的话语体系，既要有浓郁的“中国味儿”，又要有鲜明的“国际范儿”，既体现中国生态哲学特有的理论观点、价值观念、文化特征，又易于被国际学界所理解、所接受、所认同。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生态哲学研究才能更好走向世界，为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学术随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治水史，漫长的治水过程贯穿着朴素的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弘扬中华传统治水文化，汲取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对于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古代治水实践蕴含的生态智慧十分丰富，体现了古代先民对人与水、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因势利导，遵循自然规律建设水利工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就是根据岷江的洪涝规律和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特点，因势利导建设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不仅造福当时，而且泽被后世。”都江堰是我国古代的代表性水利工程，它之所以造福千载而不辍，正是基于对自然生态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都江堰利用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和水势，通过鱼嘴分水，飞沙堰泄洪，宝瓶口控制流量，实现无坝引水进入成都平原，统筹解决供水、防洪、排沙等问题。工程运行坚持“四六分水”的原则，即丰水期入江进水量约六成，外江进水量约六成；枯水期内外江分水比例倒转，这就保证了丰枯期的内外江水量都不小于40%，从而有效保障了岷江干流的生态流量。

再比如，位于福建莆田的木兰陂工程，也彰显了古代先民因势利导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智慧。木兰陂毗邻木兰溪入海处。历史上，这一地区常有洪水漫滩，若遇海潮，则海水顶托常灌，造成土地盐碱化，给两岸造成巨大灾害。为此，先民们前赴后继筑成木兰陂。这一工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科学把握了水文规律及周边地形地势，将建坝位置选在上游洪水和湖水的尾端相接处（这里两股水的力量削弱到最弱），并因地制宜采用富有当地特色的坝式，才使木兰陂屹立至今。木兰陂大大减少了南北洋平原涝、潮灾害的威胁，历经千年，功效久盛不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我们提出了‘五个统筹’，治水也要统筹自然生态的各要素，不能就水论水。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注重系统治理，科学把握水要素与生态系统整体的关系，也是我国古代治水实践中蕴含的典型生态智慧。其中，云南元阳梯田、广西龙脊梯田、湖南紫鹊界梯田等古代梯田建设，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梯田是森林、水系、田土共同作用的结果，山顶水汽充沛，滋养林木，森林将水渗入土地而排下，形成溪泉瀑布和地下潜流，在山腰被逐级拦截，供给梯田。良好的梯田系统，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统筹山水林田自然要素推动农业生产的生态智慧。我国古代梯田建设实践证明，只要把握规律、方法得当，就可以实现人水和谐、天人互益。

此外，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水利建设调节和保护生态系统，也是我国古代治水实践蕴含的重要生态智慧。经济发展不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治水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发展需求，而非仅仅限于救灾防患。只要理念科学、做法得当，水利建设还可以发挥调节、改善和优化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这方面，我国古代治水实践中也有不少生动案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基鱼塘”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历史上曾因地势低洼而水潦频仍，常年洪涝不断。饱受潦患的当地先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一些低洼地挖塘，将挖出的泥填高地而成基，在基上种桑、塘中养鱼，以桑叶育蚕、蚕沙喂鱼、塘泥肥桑，从而逐渐把低洼地改造成为著名的桑基鱼塘。这种方式把除涝、自然净化水质、调节生态系统等结合起来，将治水措施有机融入生态系统之中、融入生产生活之中，将利用自然和调节保护生态有机结合起来，有效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为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从古代治水实践中汲取生态智慧

陈茂山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学理支撑

——《“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出版座谈会纪要

本报记者 赵渊杰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围绕如何进一步深化“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提出，“两个结合”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极大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指明了正确方向。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跨学科、有组织的科研，加强基础性、原理性问题研究，持续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研究阐释，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学理支撑。与会者认为，《“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著）一书的出版，为深化“两个结合”研究阐释提供了有益参考。

信息快速

制图：汪哲平

坚持“两个结合” 培育弘扬生态文化

赵厚均 赵睿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今年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在“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的目标任务中，突出强调培育弘扬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导向，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成果的总结、凝练和传承，包括生态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等，是生态文明的文化样态。它传递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唤起人们向上向善的生态文化自觉，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文化滋养和内生动力。培育弘扬生态文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的内在要求。

人与自然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等的深刻揭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传承和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实践基础和文化底蕴。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根本观点和核心理念，把握“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要求，方能明晰生态文化的发展方向，构筑生态文化的价值根基，更好发挥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的思想引领和

价值导向作用。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文化，其中蕴含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思考和经验智慧，为培育弘扬生态文化提供了重要基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华先民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中，形成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自然观、“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发展观、“顺天应时、建章立制”的制度观，强调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的内在统一性，倡导遵循自然规律进行生产生活，追求天地人的整体性、系统性以及和谐性。同时，与“天人合一”思想相适应的是文人将自身融入自然和天地之间的一种共识和自觉。在传统生态价值理念和精神品格的影响下，产生了一大批以诗词、小说、散文等为主要文学体裁，以绘画、陶瓷、戏曲、园林等为主要艺术形式的传统生态文化，充分展现了古人对于自然之美、自然之韵、自然之情、自然之作的独特审美情趣。培育弘扬生态文化，要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阐释蕴含其中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挖掘整理蕴藏在典籍史志、民族风情、民俗习惯、人文轶事、工艺美术、建筑古迹、古树名木中的生

态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发展繁荣生态文化的深厚基础。

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的火热实践和光辉历程，为培育弘扬生态文化提供了鲜活素材。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需要立足本土，深入挖掘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动实践、感人故事和先进人物，着力打造传播生态文明价值观念、体现生态文化精神、反映民族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制作精湛、品质精良、风格独特的生态文化产品，充分展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讲好生态环境保护故事，赞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促进人们思想、认识和行为的转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文化教育活动，引导人们将生态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之中，积极涵养生态道德，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切实将生态价值根植于心、付之于行，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海事大学）